

中国林业出版社

园林绿化工程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延安整风

王寅城 邢济萍 编写
新华出版社



54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王首道 康克清

主编：苏双碧

副主编：陈君聪

编委：李捷 曹宏遂

周道荣 宋镇铃

马宝珠

责任编辑：张传秀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延安整风

王寅城 邢济萍 编写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27,000字

1991年4月第一版 1991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 7—5011—0977—X/K·136 定价：1.00元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延 安 整 风

王寅城 邢济萍 编写

目 录

- 一、为什么要进行延安整风 (1)
- 二、延安整风的内容 (6)
- 三、延安整风的经过 (13)
- 四、延安整风的基本方针和方法 (38)
- 五、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 (41)

延安整风，是指中国共产党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又称整风运动。由于这次整风是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开始的，而且又是以延安的整风为中心，因此人们通称这次整风运动为“延安整风”。由于这次整风是从1942年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著名讲话以后才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展开的，因此通常又称为1942年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一个伟大创造，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通过延安整风，全党普遍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掌握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理和方法，使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思想上成熟、政治上统一、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延安整风的历史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

一、为什么要进行延安整风

为什么要进行延安整风？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首先，是因为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其次，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状况和党的建设的需要；再次，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所处的主客观环境提供了进行整风的可能条件。

延安整风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

史转折关头。

1940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德、日、意法西斯加紧勾结，1940年9月，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军事条约。在欧战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德国法西斯相继占领了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等14个欧洲国家。1941年6月，德国单方面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了对苏联的全面进攻。同时，日本也加紧了它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步伐，积极推行“南进”政策，并于1941年12月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从而把侵华战争扩大为太平洋战争。世界形势的这种重大变化，形成了包括苏联、中国、英国和美国等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汇合起来，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不能不给中国的抗日战争以重大影响。

由于日本企图把中国变成它“南进”的后方基地，便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军事进攻。在1941年和1942年间，日本集中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伪军的全部，加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积极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在全国各地制造了无数次反共磨擦，并派出几十万大军包围封锁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在所谓“曲线救国”的掩饰下，许多国民党要员和高级将领纷纷投敌，以至“降官如毛，降将如潮”。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亲日派公开正式投敌，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所谓“国民政府”的傀儡政权，并开始组织反共反人民的

伪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空前困难的境地。根据地人口由1亿降到5千万以下，军队由50万减少到40万。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时候，我们的困难真是太大了，曾经弄到了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能否制订和贯彻正确的方针政策，领导全国人民渡过难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严重考验。

其次，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状况看，当时也需要进行一次认真的整顿。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党内也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为学风、党风和文风三个方面。他指出：我们的学风不正，就是有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毛病；我们的党风不正，就是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我们的文风不正，就是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不正之风，在遵义会议之前的几年间，曾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在遵义会议之后，它们虽然不占统治地位，但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妨碍着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遵义会议虽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但是还来不及对它从思想上错理论上进行彻底的清算。王明不但没有改正自己的和错误立场，反而于1940年3月在延安再版了他在30年代出版的《两条路线》（后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并大言不惭地在“三版序言”中声称：“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党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

助。”为什么王明的小册子还能够在延安再版？这说明不仅王明本人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危害没有认识，而且还有许多党的干部对王明这种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者的面目认识不清，他的错误思想在党内还有一定市场。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时局和政策的指示》（即《论政策》）时，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些同志不同意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路线错误的提法，认为只是策略上的分歧。这说明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在全党还缺乏统一的认识。为了分清路线是非，从思想上彻底清算王明路线的错误及其恶劣影响，就必须进行一次认真的思想上的整顿，使全党从错误路线、特别是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进而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高度的一致。这正是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客观要求。

此外，从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获得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人发展到1940年的80万人，猛增了十几倍。在发展的新党员中，除了少数工人农民外，还有相当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据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统计，该院党员中在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占74%，而其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又占了82%。这些新党员绝大多数是爱国的、进步的，怀着满腔抗日救国热情。但是他们大多还没有经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残酷革命斗争的考验，他们的头脑里还有不少小资产阶级和其它非无产阶级思想，诸如个人主义、主观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

主义等等，许多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这种状况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和使命来说，显然是不相称的。在这种情形下，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第三，当时虽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诸多困难，形势十分严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已经具备了进行整风的主客观条件。

从主观条件看，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嗣后，又战胜了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党的错误，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及时纠正了陕北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在西安事变中，中共中央采取正确方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之成为“时局转变之枢纽”，促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中央还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建立并巩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地开展了人民游击战争等等。这些都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已经确立，而且有着一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而又了解党的历史的领导骨干。因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组织领导一次全党范围的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主观条件。

从客观条件来说，进行整风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当时从总的形势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敌我形势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虽然用大量兵力投入解放区战场，但也没有力量把解放区消灭掉。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扎下根，特别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相对比较稳定，中共中央有可能从前方和各个根据地抽调一批负责干部到延安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风学习。

上述情况说明，进行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于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一场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便顺利地在全党展开了。

二、延安整风的内容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任务。

学风问题，实质上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也是一个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

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理论和实际结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来射中国革命之“的”。这是唯一正确的态

度。另一种是理论和实际分离，从主观愿望或感情出发，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机械地搬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词句，把它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当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以为可以不费力气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毛泽东将这种态度称之为是主观主义的学风。

毛泽东说：“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仅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还指出：“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另一方面表现为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这两种表现，以教条主义最为严重，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也最大。“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如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统治全党四年之久，造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全国革命根据地损失90%以上，使白区党的地下工作损失更加惨重。可见这种教条主义危害之烈，“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

命。”为此毛泽东大声疾呼：“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那也是不正确的，会对革命事业造成危害，而且他们也很容易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因此，要反对主观主义，就必须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倡唯物辩证法。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主观主义；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认真学习理论。

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学风，推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3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序言》中，重申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同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又向全党提出了“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同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不久，又设立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任主任，任弼时任副主任。在此前后许多党的高级干部纷纷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同年9月，中共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以蔡畅为团长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赴陕甘宁边区各县进行调查研究。调查团出发前，毛泽东向该团作了《关于农村调查》的

讲话，指出：“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的知识。”1942年1月，张闻天亲自率领一个农村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作了为期一年半的调查研究，写了《米脂杨家沟调查》、《兴县调查》等书，回到延安后给中央写了《出发归来记》的报告。朱德也率领调查团，深入部队，解决实际问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深入甘泉县了解情况，体察民情。一时间，党的各级干部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大大改善了党群关系，也使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学风得到了克服。

党风问题，就是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以保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这是延安整风的第二项任务。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执行的是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它的宗派主义有几个特点：一是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凡是对他们的错误路线不赞同、不拥护、不支持或不积极贯彻执行的人，他们一概视作异己，冠之以“右倾机会主义”、“调和主义”或“富农路线”等等的大帽子，一棍子打死；二是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干部路线。他们采取“以我划线”的方针，从中央到地方大批撤换他们看不顺眼的干部，轻率地提

拔一大批缺乏工作经验、没有群众基础、只知盲目服从的年轻干部；三是大搞肃反扩大化，把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同错误的肃反政策结合在一起，大搞逼供信，诬陷和迫害了大批好干部，使党的事业受到令人痛心的损失。

延安整风时，宗派主义在党内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但是由于历次错误路线的影响，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使党内还严重存在着宗派主义的残余。这种残余，在党内主要表现在各种相互关系上，如个人与党的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各地区之间干部的关系，新老干部之间的关系，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之间的关系，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等等，无不有所反映。还有些同志闹独立性和“山头主义”，只顾自己分管的局部工作，没有全局观点，忘记了局部服从整体、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还有一些同志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闹名誉、闹地位、出风头，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之间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庸俗作风带进党内。也有些同志缺乏团结观念，以邻为壑……如此等等。这些现象，极大地妨碍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这种宗派主义的残余，表现在党外，则是看不起党外人士，妄自尊大，不尊重别人，看不到别人的长处。这种排外倾向，不仅影响了党群关系，也妨碍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执行，同样是极为有害的。

通过整顿党风的学习，许多同志检查了个人与党的关系以及干群关系、军地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对于个人主义、本

位主义、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官僚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等不良倾向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宗派主义的残余现象基本上得到克服。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宣传工具，是藏污纳垢之地。

党八股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与老八股、洋八股一脉相承的。

五四运动时期，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一些浅薄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照搬照抄外国教条和现成的公式，满口希腊罗马，满口马恩列斯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如何如何。毛泽东将它称之为洋八股、洋教条，或新八股、新教条。毛泽东指出：“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和发展。”为什么叫它“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报告中曾经分析了党八股的种种表现，归纳为“八大罪状”，它们是：（1）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有些同志写文章、演说，象“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但是空空洞洞，毫无内容。（2）装腔作势，藉以吓人。有些同志的文章和演说，常常用吓人的词汇，通篇引经据典，拉大旗，作虎皮，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3）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有些人对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4）语言无

味，象个瘪三。有些文章和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没有生动活泼、切合实际的语言，只有死板的几条筋。

(5) 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有些人写文章和做报告，总是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再套1 2 3 4，全是表面现象的罗列，没有真正的内容，“这是一种最低极、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是不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6) 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有些人写文章和做演说，事先不研究、不准备，写好也不多看几遍，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责任心薄弱。(7) 流毒全党，妨碍革命。(8) 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就是典型的党八股，全篇都是大一二三套小1、2、3，再套甲乙丙丁、ABCD，充满着八股教条。

关于党八股的危害，毛泽东指出：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独立自由的希望。那末，整风运动中我们党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种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党内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摧毁廓清的目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1942年12月28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

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认真检查过去和现在的工作，以及所写的文件、指示、报告、论文、会议记录、讲义、文艺作品、笔记及工作方式等等，坚决肃清党八股的余毒。

通过整顿文风，党八股的状况有所克服。许多同志在写文章、作讲演时，不再是引经据典、甲乙丙丁了，不再是无的放矢、空洞无物了，作报告时也不再是千篇一律了。

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生动活泼的革命文风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党风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的文风，同他的学风和党风一样，堪称典范。如在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全文5万字，仅有两处引用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话，引文总共才45个字。他的许多文章和演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观点鲜明，有的放矢，既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也不无病呻吟，拼凑文字，没有一点八股气。

三、延安整风的经过

延安整风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学习准备阶段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强调，全党